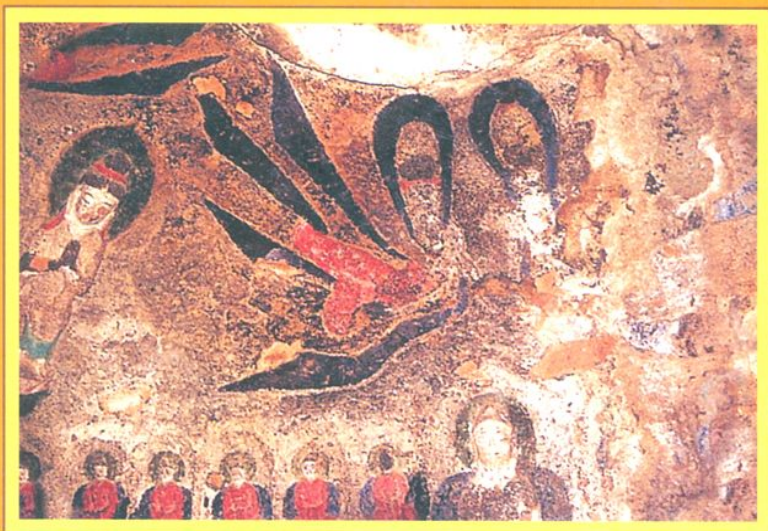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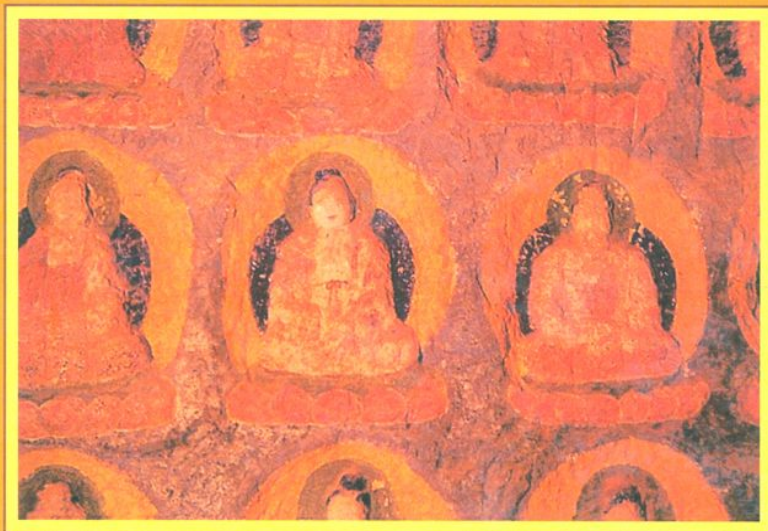


刘建华 著



少林文化研究

丛书

# 義縣萬佛堂石窟

科学出版社

《少林文化研究》丛书

# 义县万佛堂石窟

刘建华 著

科学出版社

2001

少林文化研究丛书

季羡林



## 《少林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释永信 温玉成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标※者除外）

释永信※ 释印松※ 释延王※

马世长 吕鸿儒 朱 雷

刘凤君 刘建华 汤 池

孙世昌 远 征 杜斗城

李书有 李昆声 李富华

张丽明 张家泰 阿 德

陈国灿 陈景富 林秀贞

易陶天 周 到 周伟洲

晁华山 黄夏年 董玉祥

温玉成 雷从云 樊锦诗

## 上下求索 成绩不凡

刘建华君的专著《义县万佛堂石窟》终于出版了。这是万佛堂石窟创建 1500 年以来惟一的一部专著。它既具有佛教石窟考古报告的完整性，类型、分期的准确性，也包含了部分窟龕的复原研究、对造窟功德主的推论等，还对三燕及北魏前期佛教史进行了广博的考证。刘君多年来上下求索，成绩不凡，很值得鼓励与祝贺。

论起学术传承，我于 20 世纪 60 年代投师于北京大学宿白教授门下；刘君于 90 年代投师于宿白教授及我的师兄马世长教授门下；80 年代中叶以来，她曾求师于我，调查过河北井陘县南障城石窟等。如此，刘君先是我的学生，继而成了我的师妹。我们都是宿白教授的门生。佛教考古，既艰辛又深奥，不坐几十年冷板凳难出成果，出了成果也无经济效益，故莘莘学子，往往弃之而去。国内以此为业的博士、硕士，寥若晨星，状况堪忧。而急功近利，狂解塞路者，适应浮躁的风气，却不乏其人，此尤堪忧也。刘君居官而不攀富贵，返身而入学海，孜孜敏求，不亦难乎！

《义县万佛堂石窟》虽研讨辽宁义县一地之佛迹，却广涉重要的学术问题，尚有待深入展开、探讨。

一是麦积山石窟开创的时间问题。刘君在第五章之四“南燕佛教”中，肯定了公元 407 年左右慕容超妻呼延氏在麦积山第 76 号窟造像的真实性。对此，不少人曾表示怀疑，认为第 76 号窟窟形属北魏后期（公元 502~534 年），以当时人不能称自己为“南燕”云（见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中国佛教石窟概论》，文物出版社，1993 年）。据张锦秀执笔的《麦积山石窟志》介绍，“此则题记上，原有一层白粉”。从而可判断：第 76

号窟经后人改造过，原题记也被覆盖过。仇池杨难当被北魏封为“大秦王”，而北魏人则称之为“南秦王”。后秦姚兴称慕容超为“南燕”是可能的；而流落于后秦的慕容超妻呼延氏用南燕自称，也顺理成章。近年间，笔者又依庾信（公元513~581年）《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并序》，考证杯度（公元？~426年）早在公元402~405年间即在麦积山开龕造像；麦积山的“秦州模式”是中国最早期的石窟造像（见温玉成：《中国早期石窟寺研究的几点思考》，刊于《敦煌研究》2000年2期）。“秦州模式”及稍晚的“凉州模式”，共同影响了“云冈一期”的造像。云冈“昙曜五窟”中没有塔柱洞，即是受“秦州模式”的影响所致；而第17窟的主尊交脚像，则来源于“凉州模式”。

二是高句丽接受佛教的时间问题。刘君在第五章之六“三燕佛教与东渐高句丽”中有全面的论述。文中“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公元372年），应是一次外交行动。正确的理解应是，只有高句丽人已信佛法，苻坚才派使臣及僧人至高句丽修好，并送去高句丽所需要的佛像、佛经。据《高僧传·僧朗传》及《续高僧传·僧意传》可知，公元351年僧朗与僧湛、僧意隐居泰山西北金舆谷以后，有高丽、相国、胡国、女国、吴国、昆仑、代京等七国，给僧朗等人送来了金铜佛像。其中的“高丽”，即是高句丽；而“相国”，亦是高句丽的一个封国。其地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西永陵镇一带（见《水经注》卷十四）。这就是说，在公元351~381年的30年内高句丽及相国都制作过金佛像。从而可推知，佛教传入高句丽，必在公元350年以前。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集安长川一号墓高句丽佛教壁画中，“坐佛”被置于“南方”，与公元1至3世纪中原地区的“仙佛模式”相一致（见温玉成：《公元1至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刊于《敦煌研究》1999年1期），反映了高句丽佛教与中原的密切关系。

三是关于龙门风格，即“中原风格”的影响问题。李文生先生在《我国石窟艺术的中原风格及其有关问题》中斷言：“北魏南迁洛阳后，洛阳已成为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除新疆、河西走廊以及陇右、云冈石窟中的十六国、北朝早期的石窟造像以外，我国内地现存

的开凿时间都晚于龙门石窟的大部北朝石窟，就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中原佛教及其艺术的昌盛和影响而大量地修建起来。”他又具体指出：“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可能受到中原风格的影响”；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的第165窟“是接受了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影响而开创的”。关于义县万佛堂石窟与中原北方石窟的关系，刘君指明，义县万佛堂石窟“总的来看，受云冈石窟的影响远远大于龙门石窟”，“它的主体直接源于云冈石窟”，这些应是科学的结论。同样，关于庆阳北石窟寺的第165窟“还多少带有一些北魏早、中期的特点，是因为当时我国佛教艺术还处在一个交替变化时期”，或认为“做法与云冈近似”（见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这说明，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所造的石窟统统归结为受“中原风格”的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形而上学的结论。龙门“秀骨清像”风格的形成，约在公元500~510年间。只有在此之后，龙门风格才会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的造像。

四是关于佛穿“褒衣博带”式新装的问题。5世纪中叶以前的佛装，只有通肩式大衣和袒右肩式大衣两种，总称袈裟。或许犍陀罗的袈裟一般是毛织物，所以早年写做“鞞鞞”。葛洪作《字苑》，始改从衣，写作“袈裟”，是红色法衣（《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佛穿“褒衣博带”式大衣，大约起自南朝宋。《宋书·礼志五》记载，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经过一番考辨才决定元正朝贺时，“皇太子”可以服“袈冕九章衣”。释迦牟尼是由皇太子而成佛的，自然也可以服“袈冕九章衣”——褒衣博带。

今所知佛穿新装最早的文物，是20世纪20年代川西茂县出土的南朝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碑。它正面刻“千佛”及“当来弥勒成佛”像，背面刻“无量寿”世尊像。此后，此等新装在南朝普遍采用，在云冈二期亦偶有用者。孝文帝迁洛后，龙门皇室开凿的古阳洞、宾阳中洞等大窟，即用此新装。但小型龕中，仍有使用通肩或袒右大衣者。刘君指出，自平城，沿上谷路，以至龙城，至义县，均未发现“褒衣博带”式袈裟的佛像，应是南朝文化影响较弱的表现，亦属正常现象。同样，南朝齐的“弥勒成佛”像，早已是结跏趺坐的样式；而在北魏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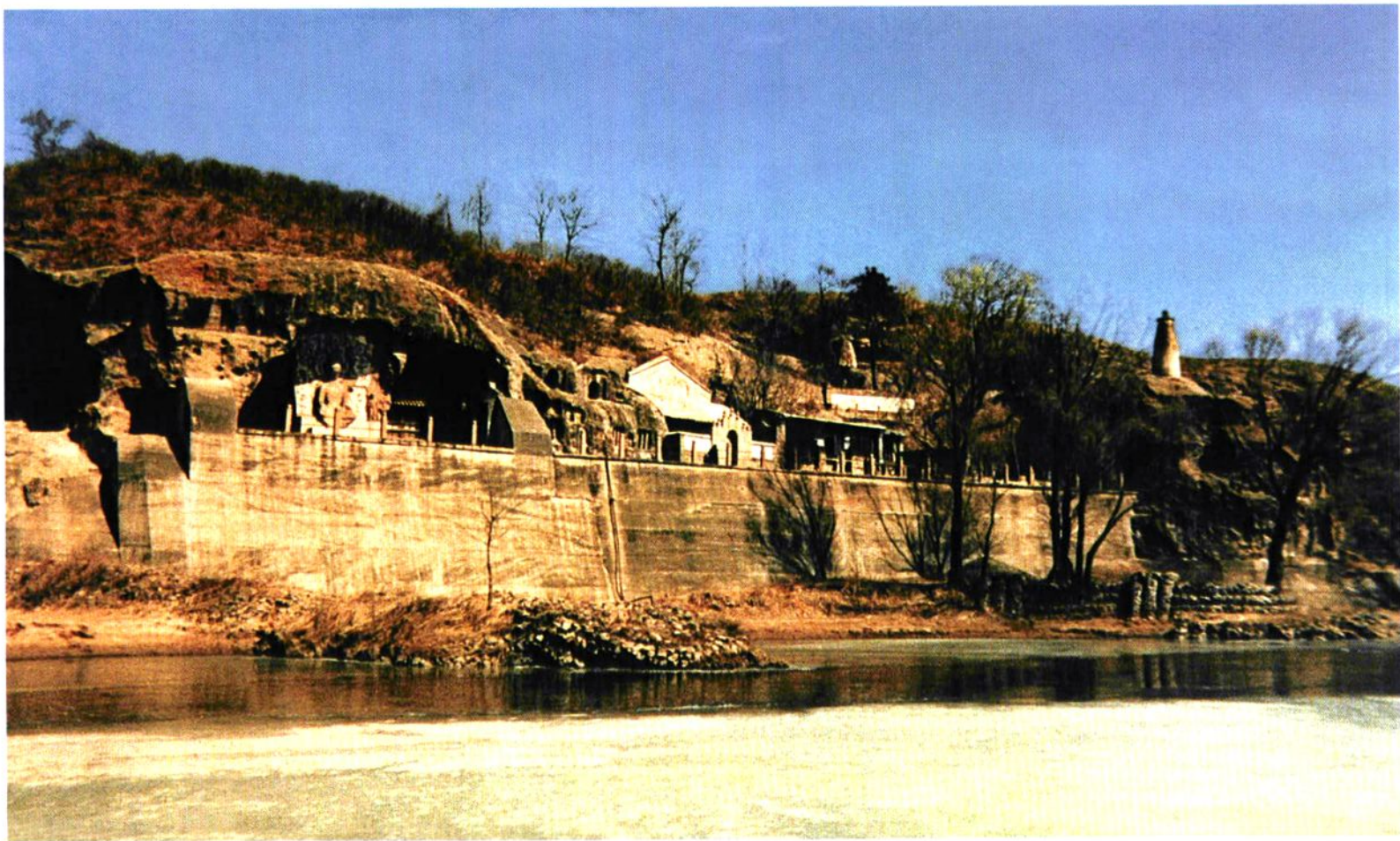
却仍是交脚的坐式。南北文化的差异，于此可见矣。

刘著《义县万佛堂石窟》的出版，凝结了一段僧俗合和的因缘。永信大师以弘法为己任，更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矢志。在少林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刘君结识了永信大师，谈及出版之艰难。永信大师商讨于我，我即告曰：善哉。此又一功德也。刘君请我作序，便欣然允诺。一来是感谢宿白教授对弟子们的谆谆教诲；二来是鼓励青年学者奋进不息。匆匆草此，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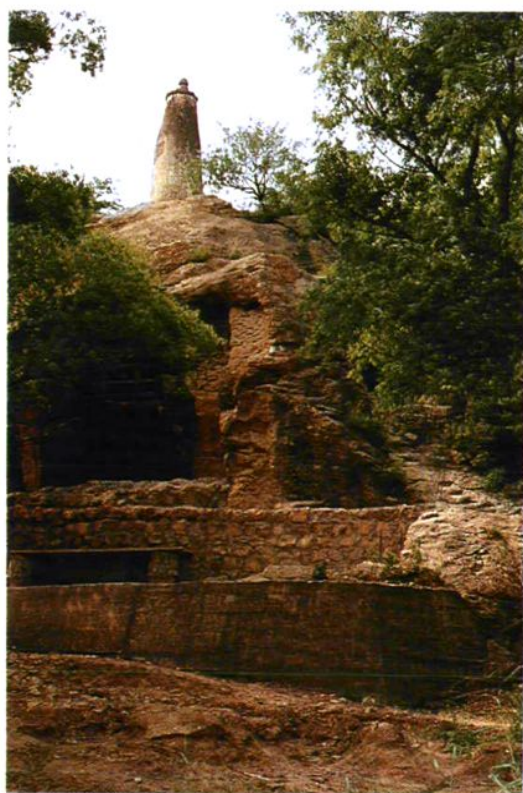
温玉成

2000年7月9日于洛阳应天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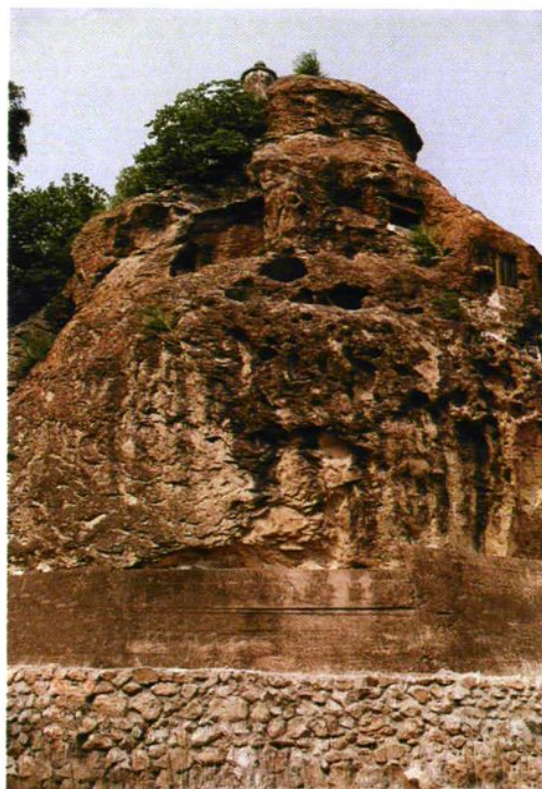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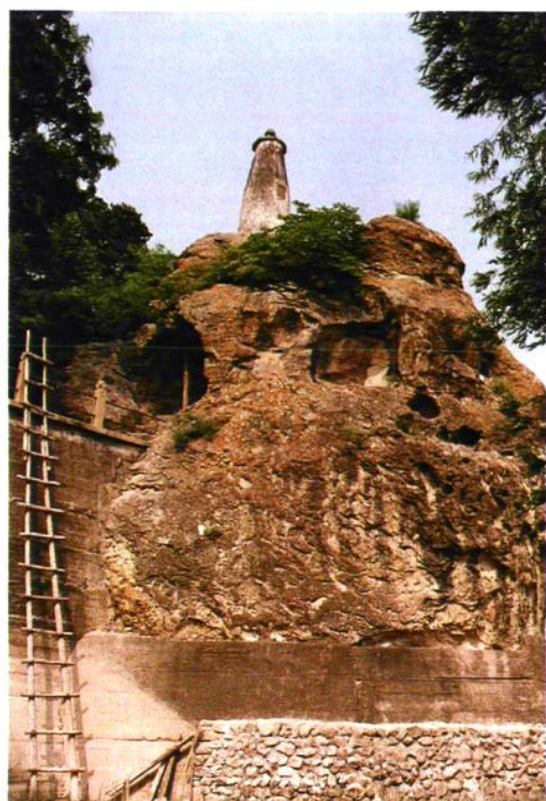
图版1 义县万佛堂石窟全景（1985年摄）



图版2 东区第1~3窟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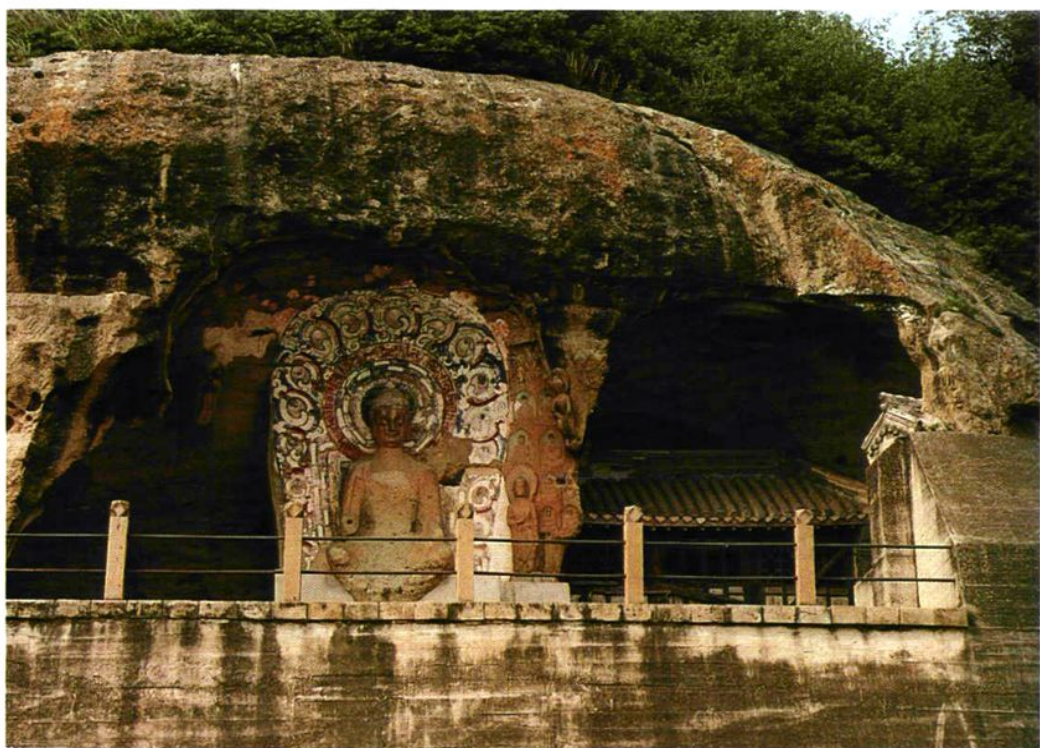
图版3 东区第5~7窟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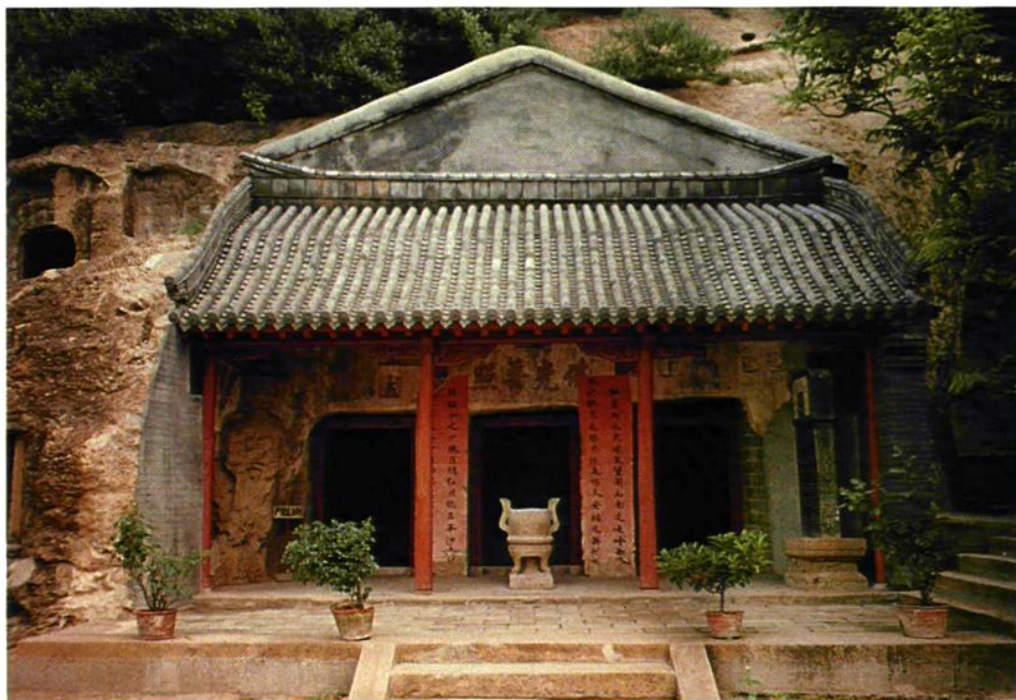
图版4 东区第7、8窟外景



图版5 西区第1-4、7、8窟外景



图版6 西区第5、6窟外景



图版7 西区第1窟前庭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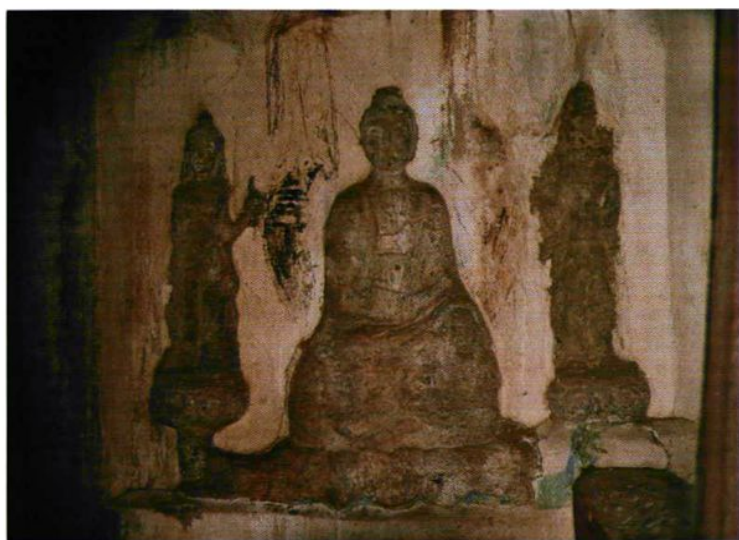
图版8 西区第1窟前庭西侧  
力士（由西向东）



图版9 西区第1窟前庭西侧  
力士（由东向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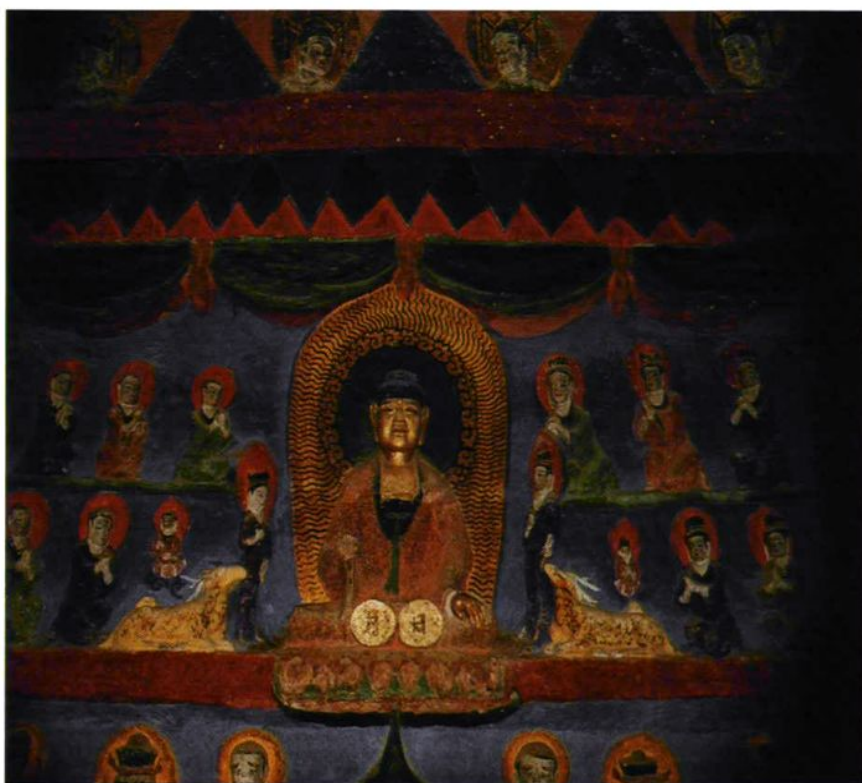
图版 10 西区第 1 窟前庭  
右壁上方七佛龕



图版 11 西区第 1 窟前庭后  
壁上龕一佛二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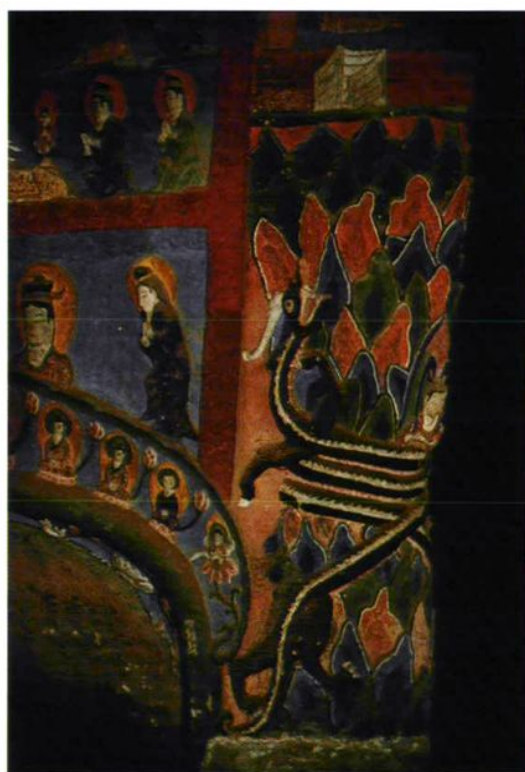
图版 12 西区第 1 窟前庭后壁  
下龕男、女供养人



图版 13 西区第1窟中心柱南面上层中部龕像



图版 14 西区第1窟中心柱南面上层东侧龕像



图版 15 西区第1窟中心柱南面须弥山



图版 16 西区第 1 窟中心柱南面下层龕主尊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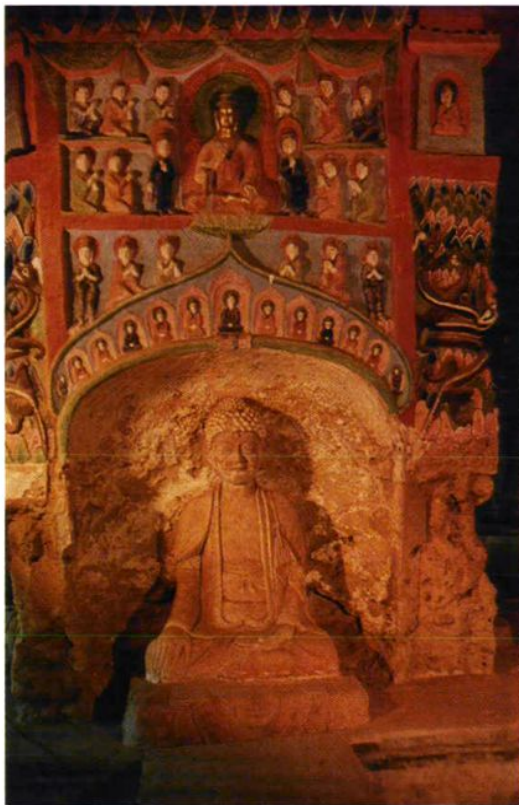
图版 17 西区第 1 窟中心柱南面下层龕内西壁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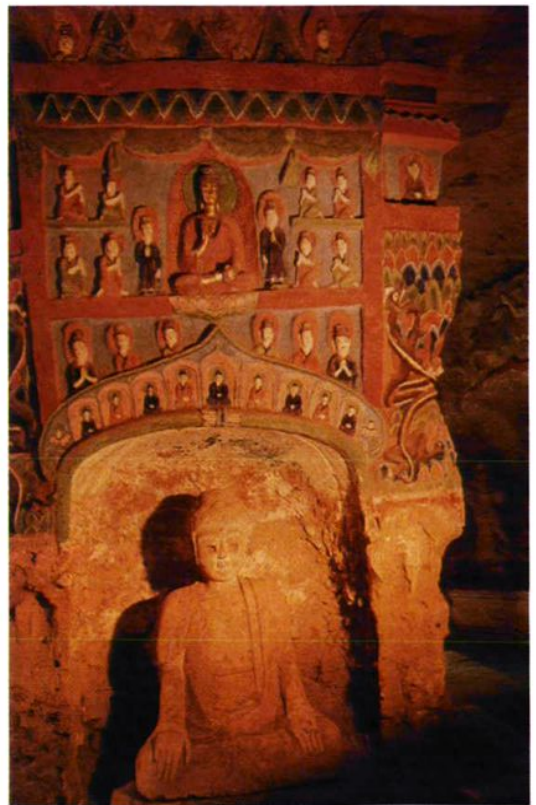
图版 18 西区第 1 窟中心柱南面下层龕内东壁飞天



图版 19 西区第 1 窟中心柱东面上层中部龕像



图版 20 西区第 1 窟中心柱东面龕像



图版 21 西区第 1 窟中心柱北面龕像





图版 22 西区第 1 窟中心柱北面上层中部龕像



图版 23 西区第 1 窟中心柱西面下层主尊